

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

■ 陈 锋 主编



全国
优秀出版社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武汉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托项目

现代化进程研究

● 冯天瑜 陈锋 主编

陈 锋 主编

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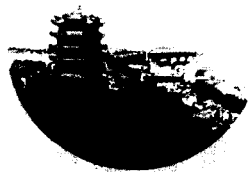
武汉 现代化 进程 研究

1K296.31-53

76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武汉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托项目

○ 冯天瑜 陈锋 主编



全国优秀出版社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冯天瑜,陈 锋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7

15 至 20 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陈 锋主编
ISBN 7-307-03529-4

I. 武… II. ①冯… ②陈… III. 现代化—研究—武汉市 IV.
D676.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6166 号

责任编辑: 张俊超 责任校对: 程小宜 版式设计: 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印刷: 湖北省通山县印刷厂

开本: 787×980 1/16 印张: 29.5 字数: 573 千字

版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3529-4/D·482 定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言：武汉早期现代化刍议	1
(作者：冯天瑜)	
一、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	6
(作者：陈 锋)	
二、汉口：近代前夜的社会保障	18
(作者：张建民 周 荣)	
三、近代前夜汉口商人的文化生活：1800—1840	41
——以《汉口丛谈》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张 岩)	
四、汉口模式与中国商业近代化	58
(作者：任 放)	
五、晚清武汉经济发展及其特征	67
(作者：李卫东)	
六、晚清武汉社会的变迁	74
(作者：李卫东)	
七、晚清汉口的对外开放	86
(作者：蔡国斌)	
八、近代汉口开放与武汉城市功能转换	115
(作者：张笃勤)	
九、交通现代化与武汉城市经济演变	122
(作者：张笃勤)	
十、张之洞与武汉近代化	133
(作者：何晓明)	
十一、近代化、权威主义与张之洞效应	149
(作者：任 放)	
十二、辛亥革命与近代武汉及湖北工业	155
(作者：徐凯希)	

十三、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武汉及湖北工业	164
(作者: 徐凯希)	
十四、民国年间汉口棉花市场	172
(作者: 徐凯希)	
十五、民国年间武汉经济地位下降原因述论	180
(作者: 彭敦文)	
十六、武汉旅游发展的近代化历程	191
(作者: 王国华)	
十七、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之比较	258
(作者: 李宪生)	
十八、武汉人的形象	278
——对武汉人自我形象的实证分析	
(作者: 罗敦讲)	
十九、武汉现代化现状: 比较、评价与对策	300
(作者: 周长城 陈 群)	
余论: 新世纪武汉展望	323
(作者: 陈 锋)	
附录: 国外学者笔下的汉口	328
汉口 (英) 菲尔德维克	328
(译者: 姚伟均)	
十九世纪汉口的贸易 (美) 罗威廉	351
(译者: 朱丹 江榕, 校者: 彭雨新 鲁西奇)	
十九世纪汉口的市民 (美) 罗威廉	386
(译者: 罗杜芳, 校者: 鲁西奇)	
在汉口的外国人权益 (日) 井上博治	430
(译者: 杨华, 校者: 李少军)	

导言：武汉早期现代化刍议

我们面对的“武汉现代化”议题，跨越时段颇长，并且涉及到几种社会形态，为避免泛泛，这篇短文从“早期”现代化入手。而“武汉早期现代化”可从一般、特殊、个别三个级次展开讨论，也即从现代化、中国早期现代化、武汉早期现代化逐层辨析。至于对“武汉现代化”的全面观照，则可从本书全篇获得。

（一）

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是继人猿揖别、农业萌生之后人类史上的第三次跃进，这是一个多侧面、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涉及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相综合的结构—功能变革。现代化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内涵，它们又交融互摄，彼此渗透，呈现多元一体的共生互动状态。

就现代化的物质基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而言，约指由自然经济主导的农业文明向商品经济主导的工业文明演进。其显著标志是，有生命动力系统（人力、畜力）为无生命动力系统（矿物燃料、水力、核能）所代替，机械生产取代手工劳作，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物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这一系列深刻变化的动力之一，来自科学技术革命；反之，工业化过程又为科技革命提供源头活水、用武之地与无尽资源。因此，工业化与科技革命是互为因果的。它们互相间的生成次序，颇类似鸡生蛋、蛋生鸡孰先孰后，难以断论。

与经济领域的工业化相为表里，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域发生“专制—人治体制”向“民主—法治体制”转化；社会领域发生静态的、彼此隔绝的“乡村式社会”向动态的、被种种资讯手段联系起来的“城市式社会”转化；观念领域发生“神本”向“人本”、“信仰”向“理性”的转化；教育则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大众共享。总之，近几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使我们这个星球的状貌和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发生空前巨大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赢得一种持续的加速度，并在地理空间上不断拓展（由西欧扩散到世界各地），在文明的现代性上愈益向深度进军（如当前正从工业化转向后工业化或称信息化）。

(二)

时至今日，现代化已是一个遍布全球的，但各区间又极不平衡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首先根源于早期现代化生成史的特色：它不是在全球各地纷然并起的，而是在某一角落率先勃兴，渐次弥散开来的，因此，其间有先行者与后起者之分，原创者与学习者之别。后起者中则有快速追进者与迟缓跟随者的差异，而迟缓者又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变为快速者。

早期现代化，即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需要一系列内外条件的集合，除前述的科技革命外，关键条件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而西欧的某些地段十分难得地最早集合了这些条件。以 15、16 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世界性远航开其端绪，现代化过程在西南欧（意大利等）首先启动，而其正式展开则是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于 18 世纪在西北欧（英国、尼德兰、法国等）陆续发生。生成于西欧的工业文明伴随着殖民扩张，延及到土著尚处石器时代的北美与澳洲，又与中南美、中东、南亚、东亚一系列悠久的古典文明发生剧烈的冲撞与融会。世界历史以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契机，从分散走向整体，五洲四海的国家与民族，或主动或被动，或从被动转为主动，先后汇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大潮之中。

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 15、16 世纪之交的现代化是从中世纪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故可称之“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对于所有其他地区（如中欧的德国，东欧的俄国，中东的土耳其，东亚的日本、中国等等）而言，现代化是在西欧现代文明的威逼和示范之下发生的，故可称之“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当然，言其“外生”，并非说西欧以外国度的固有文明与现代化无关，而是指那些国度本土固有文明尚未发育到自生现代化的程度，现代性与传统性不兼容，其现代化启动的直接导因是外来现代文明的强烈刺激，而那些国度的固有文明则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着深刻而久远的阻滞或推进作用。

(三)

自 19 世纪中叶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演绎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坎坷历程，经历了现代转型从迂回迟缓期到快速急进期的变更。

中国具有悠久而灿烂的文明传统，其成熟的农本经济、强固的君主专制政体、完备的典章文物，到宋代达到烂熟程度，明清承其绪，在固有轨迹上又有所更张，自明中叶到清中叶，其经济、文化领域已出现某些近代性因子，但就整体而言，传统社会并无解体迹象，全体国人仍习惯性地徘徊在中古故道，并自外于 18 世纪以降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生动表现，便是 1793 年清朝乾隆皇帝接见已实现工业

革命的英国使臣时，却自诩“天朝”“无所不有”，拒绝与“外夷”通商、建交，显出一种“集体孤独症”，丧失了早期现代化起步的一次机遇。这种情形迁延至19世纪中叶，当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在侵略中东、南亚以后，终于把矛头指向东亚时，中国朝野还沉迷于中古旧梦。西方列强的暴力来袭，强行打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拉开中国现代化进程序幕的启动力，来自于西洋人炮舰的轰击、机织布的涌入和鸦片的毒害。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具有区别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一系列特征。

其一，由于中国现代转型是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启动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威胁，使中国面临旷古未遇的国防危机，故中国早期现代化首先是对这种危局的防御性反应。如果说，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是从较易实现原始积累、赢得利润的轻工业起始的，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则开端于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兴建的第一批现代化工厂，如1865年李鸿章设于南京的“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设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设于福州的“马尾船政局”，1867年崇厚设于天津的“北洋机器制造局”，莫不是制造枪炮、弹药、舰只的军工厂。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机器工业也全然是这种“兵工洋务”的产物，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便主要为“强兵”而设，枪炮厂自不待言，张之洞设铁厂，也是出于这种认识：“今日之铁，明日之械，”“今日之铁，明日之轨。”（铁轨，指卢汉铁路，而修此铁路的主要目的又是运兵。）后来建立的“纱布丝麻四局”等轻纺工业，虽号称“求富”，但其利润也主要用于填补铁厂、兵工厂的巨大财政亏空。

其二，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自身社会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形下，因外力逼迫，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故这是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现代转型。因为中国是在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不兼容的情形下开始实施现代化的，故而需要依仗超经济的强制手段，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作用异常突出。晚清的早期现代化，在中央是由奕訢、文祥等较早与洋人打交道的亲贵主持的，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掌握朝中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地方上，则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实际操办，继起者则有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上海、天津、武汉之所以成为晚清现代工商业的三鼎足，除三地特定的区位优势、西洋势力的渗入等因素外，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的坐镇直接相关。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与军政强人的活动关系密切，以至人存事兴，人亡事衰，现代化进程不断发生大起大落以至中断。这是政府大力干预的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张之洞离鄂，武汉在全国的地位渐降，张氏本人有此预言，以后的历史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与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洋务运动后期巨擘张之洞干系甚深，人们为此盛赞张氏的功勋，但张氏在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个人作用，正埋藏着武汉早期现代

化坎坷性的伏笔。这是我们在考察这段重要史事时应予特别关注的。

其三，早期现代化的题中必备之义——民族资本的成长，一直受到帝国主义的挤压和官府的限制，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段时间得到较舒畅地发展，纺织、面粉、火柴、香烟、日用百货等轻纺工业有长足进步，但从近现代大时段观之，民族资本处境堪称艰难困顿。武汉著名商号“曹祥泰”的日用百货制造业，20世纪初曾兴盛一时，抗日战争则跌入低谷；裕大华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颇有拓展，之后却饱经磨难，屡遭挫折；号称“地皮大王”，自称“创造了汉口”的刘歆生，其房地产业于清末民初势头甚健，不久即一再败绩，地产大部分典卖；创办震寰纱厂的刘鹄臣兄弟，创办一纱厂的李紫云，轧花业巨头周文轩，建立民营机器厂的周仲宣，商界名人贺衡夫、周苍柏等，也都是企业初创有成，一度颇具规模，终因战乱、天灾、政治变故或自身经营不善而一蹶不振，甚至全然倒闭。这与同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日本相较，形成明显差异。日本的民族资本，如住友、三井、三菱等财团，自江户时代兴起，经明治时代大发展，直到今天，二三百年间蓬勃运行，遂成威震全球的大企业集团。现代文明需要一种稳定的、渐进的积淀过程方能形成大气候，而中国及武汉缺乏这样一种现代文明的长时段积淀过程，许多民族企业都是“断尾蜻蜓”，武汉的民族资本家没有一位成为彪炳经济史史册的大人物。这是我们回首中国及武汉早期现代化历程时的一种深切感受。这种遗憾的造成，固然导因于战乱频仍等等客观条件，但也与国家政策一再出现大幅度摆动，造成对民族资本的惨重杀伤直接相关。前车之鉴不可忘却。

(四)

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晚于广东、上海、天津，早于多数内地城市，故就时序言之，在全国处在中上级次。自19世纪60年代开埠、洋商设厂，中经张之洞督鄂18年（1889～1907年）的洋务兴革，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汉后来居上，发展成为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建于武汉的汉阳铁厂，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早于日本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7年；建于汉阳的湖北枪炮厂是仅次于上海江南机器局的大型兵工厂，成为近现代中国陆军装备（如七九式步枪，俗称“汉阳造”）的主要生产基地；建于武昌的“纱布丝麻四局”则是仅次于上海的现代化纺织工厂系列。以汉口为起点的卢汉铁路，是纵贯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武汉还成为华中最重要的文教中心，以武汉为出发点的湖北留日学生数量，曾高居各省榜首。以武汉为主要基地的湖北新军，是晚清军制改革的模范，是屡次“秋操”的冠军得主。武汉的对外贸易额“驾乎津门（天津），直追沪上（上海）”则显示了20世纪初叶武汉在全国的翘楚地位。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在19、20世纪之

交成就斐然，颇耸动中外视听，成为现代化“后发优势”的一个例证，而其间包蕴的种种弊端，又制约着武汉的进程。在此后近一个世纪，武汉的现代化建设又续有发展，其规模与水平非张之洞督鄂时可比，但就在全国的地位而言，20世纪初叶以后的武汉则要发出“不如昔时”之叹。

重温武汉的昔日辉煌，窥探其中奥秘，对今日武汉建设具有启迪意味。19、20世纪之交的历史证明，武汉的区位优势提供了这座城市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重要的国际都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曾被历史所证明，也为高瞻远瞩的前景观察家所预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武汉的未来寄予厚望。联合国在20世纪末叶的一份未来世界十大城市名单上，列有中国的上海与武汉。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预测，武汉是21世纪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之一，并将其排在第二位。这种对武汉的青眼有加，既是对武汉历史的肯认，更是对武汉前景的看好，它立足于武汉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条件的综合考察，具有向现实转化的可行性。当然，美好前景不会自行降临，机会只在有准备的人们那里变成现实。武汉在21世纪雄风振起，尚需武汉人的智慧与勤奋，其中包括对武汉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由此推导出的既富于想像力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方略的制定。

1960年在日本箱根举行的“日本和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至今被视作关于现代化研究的一次里程碑。这次会议为现代化确定的标准中，第一条便是“人口相对高度地集中于城市和整个社会不断上升的城市向心趋势”。可见，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核心指标。作为现代都会的武汉，在近140年间，大量吸收周边县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小知识分子，形成华中地区“城市向心趋势”的最大典型。其城市化路向与上海、天津、广州等滨海都会有异有同，仅从“城市化”这一意义言之，武汉市的现代化研究，便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在中国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期，武汉现代化建设面临极佳机遇的今天，回顾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可以看到先贤筚路蓝缕的创业艰辛，洞察文明现代转型的种种不可抗拒的规律，从而为今后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而真切的经验教训。如果本书能在这方面作出些微贡献，编者不胜欣幸之至。

2001年10月1日（辛巳年中秋）撰于武汉大学寓所

一、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

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已经证实，武汉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城市（城堡、城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3 500 多年前的盘龙城时代^①。明代中期以降，随着汉口镇的兴起，最终形成了武昌、汉阳、汉口鼎足而立的武汉三镇格局。同时，因商而盛的汉口镇的出现，也使武汉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多位一体的综合城市功能。

明清以来，汉口商业繁剧，既聚集各路商帮，又中转各色货物，汉口不但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亦服膺全国四大名镇之名。“汉口”几成为武汉的代名词。以汉口为中心的武汉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从而大为提升。概观汉口在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明代中期至汉口开埠，它是传统商业市镇的兴起与鼎盛时期；二是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它是早期现代化的萌动时期；三是张之洞督鄂至清朝灭亡，它是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时期。这是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着眼进行的大致区分。兹分而述之。

（一）汉口商业巨镇的兴起与发展

明初的汉口一带，还是无人居住的芦苇荒滩。明宪宗成化年间，汉水主河道在龟山之北形成，并由此入江。汉水故道淤塞，主河道移至龟山之北后，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形成南、北两岸，南岸一侧仍称汉阳，北岸一侧则称之为“汉口”。嘉靖年间，汉口的人口增多，已有城镇居民区“坊”的出现，汉水口南岸有崇信坊，北岸则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汉口也在此时正式设镇，并设置有汉口巡检司对市镇进行管理^②。这标志着汉口镇的形成和粗具规模^③。万历年间，湖广地

^① 参见皮明庥、欧阳植梁主编：《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34 页。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20 页。

^② 按：汉口巡检司最初设置在汉水南岸的崇信坊，康熙年间始由南岸移至北岸。雍正五年，随着市镇规模的扩大，又将汉口巡检司分成仁义、礼智二分司。

^③ 据乾隆《汉阳府志》卷 12，《汉阳县·乡镇》记载，嘉靖二十四年，汉口已有居民 1 395 户。

区的漕粮均在汉口交兑，同时，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漕粮与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的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迅速发展，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①。

虽说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之际”^②，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不可能不对汉口的发展造成影响，汉口真正成为商业巨镇，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是与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天下四聚”之说，也在这一时期盛行。《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③ 汉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汉口在这一时期的繁盛程度，从“汉口镇火”的侧面记述中亦可见一斑：“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毕秋帆尚书镇楚时，尝失火烧粮船一百余艘，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④ 毕沅督楚，时在乾隆末年，“汉口镇火”所描述的是乾嘉年间的情况。乾隆初年的情况则有如下描述：

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⑤

从这里的描述来看，是时汉口的人口、商业、交通以及物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① 乾隆《汉阳府志》卷12，《汉阳县·乡镇》。

② 康熙《汉阳府志》卷1，《舆地志》。

③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按：在该卷中，刘献廷多处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其记渡船之方便云：“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其记风景云：“汉口三元庵后有亭，曰快轩，轩后高柳数百株，平野空阔，渺然无际，西往汉阳诸山，苍翠欲滴。苏州江南风景秀丽，然输此平远矣。”其记洪山寺云：“洪山寺建于武昌东门外蛇山之麓。为明楚王所建。道场宏丽，为天下第一。照墙有碧琉璃交龙，壮丽晃耀。墙宇高峻，如都门西山诸梵刹制。”其记晴川阁云：“自铁门关西上，为龟山首，有楼巍然，曰晴川，与黄鹤对峙。……楼临江东向，轩豁开爽，远胜黄鹤。”

④ 钱泳：《履园丛话》卷14，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1～382页。

⑤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

都十分显著。所谓的汉口“六大行”也在这里被首次提出,而且“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各行业间的管理臻于完善,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了“六行最大”一词,“六行”之外,也还有其他的行业,“六大行”或后来的“八大行”之说,不过是概指。汉口的行业与商品种类繁多,章学诚的《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对乾隆时期汉口丰富的商品描述甚详,已有学者作过细致的引述,可以参见^①。章氏所记述的汉口的主要商品有食盐、粮食、竹木、纺织品、药材、山珍、海味、干鲜果品、糖、香料、茶、酒、毛皮、纸张、文具,以及铜、铁、锡、石膏等矿产品,煤、炭等燃料,还有烟草、鱼类、金银珠宝等类,有具体名称者达230多种。

明清时期汉口的兴盛,是以商业贸易为起始的。这首先得益于它的区位优势,时人有所谓“九省通衢”、“九省之会”、“七省要道”、“八达之衢”等代称或习称。在汉口未名之前,明代人已注意到湖北的区位优势:“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郢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②嘉靖年间正式设立汉口镇后,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得以快速发展。即如方志所称: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所谓九省之会也”^③。“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烦剧。”^④从此,湖北的大区位优势更彰显于汉口一地。此外,湖北及邻省的经济的发展,也促成并加快了汉口的商业繁荣。

如上所述,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贸易是以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竹木等为主干的。以粮食而论,是时,湖北及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所产之米粮下销江南、闽广各省,都要通过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⑤。汉口成为米粮流转中心。以食盐而论,湖北、湖南一贯食淮盐,淮盐由仪征进入长

① 参见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448页。

② 张翰:《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

③ 民国《夏口县志》卷12,《商务志》。更早的方志,如乾隆《汉阳府志》卷12亦称:“汉口一镇耳,而九州之货备至焉,其何故哉?盖以其所处之地势使然耳。武汉当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贸迁有无者,皆于此相对代焉。故明盛于江夏之金沙洲,河徙而渐移于汉阳之汉口,至本朝而尽徙之。今之盛甲天下矣。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火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舶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

④ 民国《湖北通志》卷5,《舆地志》。

⑤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

江运至汉口，再由汉口分运湖北、湖南各府州县^①，汉口是淮盐的重要转销口岸。以《淮鹺备要》所载两淮行湖广引数777 200引，每引重量364斤计，每年由汉口转销的食盐大致在3亿斤左右，而回空盐船又载各色货物下行，从而形成循环往复的转运贸易体系。应该说，粮食、食盐等大额贸易，是汉口进一步鼎盛的重要因素。没有疑问，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繁荣以及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使汉口成为内陆特大型的市镇和全国性的商品市场。这也就是康熙时的著名学者刘献廷所说的：“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②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汉口还只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性市镇，与国外也基本上没有商业往来，是时的汉口或武汉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

（二）汉口开埠：早期现代化的契机

从武汉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国际性城市着眼，1661年的汉口开埠^③，是一个重要的界标。汉口开埠后，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外国各路商人也“立即趋之若鹜”^④，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瑞士、秘鲁等国先后来汉通商^⑤。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开始在汉口开办原料加工厂，如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所说：“1861年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俄人乃（于1863年）在此建立其砖茶工厂。”^⑥ 据统计，至张之洞督鄂前，外商在汉口开办的原料加工厂有如下数家：

① 参见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表9，《汉口至各地转运分销里程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

③ 1858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中即有汉口，但汉口的正式开埠则是在1861年。参见陈均、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6页。

④ 姚贤镐编：《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85页。

⑤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按：1861年汉口开埠前，挪威、瑞典曾援引《五口通商》条文，于1847年在汉口开展商务活动。又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称：“约在1850年，俄商开始在汉口购茶，于是汉口成为中国最佳之红茶中心市场。俄人最初在此购买者为功夫茶，但不久即改购中国久已与蒙古贸易之砖茶。”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0~111页。如是，俄国在汉口的商业活动，也是在汉口开埠之前。

⑥ 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1页。

同治元年（1863年）俄商开办的顺丰砖茶厂；
同治五年（1866年）俄商开办的新泰砖茶厂；
同治十一年（1872年）英商开办的汉口砖茶厂；
同治十三年（1874年）俄商开办的阜昌砖茶厂；
光绪元年（1875年）英商开办的金银冶炼厂；
光绪二年（1876年）英商开办的汉口压革厂；
光绪二年（1876年）英商开办的隆茂打包厂；
光绪六年（1880年）英商开办的平和打包厂；
光绪十三年（1887年）德商开办的美最时蛋厂；
光绪十三年（1887年）德商开办的礼和蛋厂；
光绪十五年（1889年）德商开办的元亨蛋厂。^①

这些原材料加工厂的开办，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如俄商开办的顺丰、新泰、阜昌三大茶厂，其生产的砖茶销往俄国和内蒙古等地，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共有资本银400万两，拥有15架蒸汽动力砖茶机，7架茶饼机，数千名中国雇工，年产值近5000万两，具有相当的规模。茶工业规模的扩大，刺激了茶贸易的增长，据统计，1874年汉口出口砖茶83402担，1877年增长为144756担，1878年增加到152339担^②。

汉口开埠后，“洋行”的出现也值得注意。1862年，被称为“洋行之王”的英商怡和洋行（渣甸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最初主要经营轮船业，后扩大经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据《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怡和洋行内部设有船头、银行、保险、进出口4部。其中，船头部下设轮船、趸船、码头、堆栈4个办事处，办理各有关航运业务；银行部开办“有利银行”，专门办理货物信托等业务；保险部经营各类水火保险业务；进出口部经营茶、棉花、棉纱、牛羊皮、五金机械等业务。怡和洋行之外，美、德、法、俄等国也在汉口设立有洋行。洋行经营的范围非常广泛，对汉口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以怡和洋行的航运业而论，其拥有客货轮20多艘，行驶汉申、汉宜、申宜、宜渝等航线，在长江流域运输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可以认为，汉口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

^① 参见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② 参见罗福慧：《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李宪生：《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资企业的兴办，都促使汉口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

以下两表，正可以看出，从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这一段时间中，在国际贸易方面，汉口的贸易额及其在四大贸易商埠（上海、汉口、广州、天津）中的地位^①。

1867~1889年汉口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

表1 1867~1872年为（上海）银两，1873年后为海关两

年份	全国进出口总额（两）	%	汉口进出口额（两）	占总额%	位次
1867	126 696 809	100	522 342	0. 41	4
1868	127 066 570	100	1 398 115	0. 89	4
1869	128 632 943	100	1 266 253	0. 83	4
1870	120 917 526	100	2 290 335	1. 69	3
1871	133 950 789	100	3 675 409	2. 36	3
1872	143 510 664	100	4 075 196	2. 52	3
1873	138 609 437	100	4 421 536	2. 86	3
1874	133 954 156	100	5 258 811	3. 96	3
1875	138 906 756	100	5 761 239	4. 15	3
1876	153 241 410	100	7 271 451	4. 75	4
1877	143 511 725	100	4 780 725	3. 33	3
1878	140 360 345	100	6 469 802	4. 61	3
1879	157 077 750	100	7 161 360	4. 52	3
1880	519 523 290	100	7 672 117	4. 82	3
1881	165 336 609	100	5 316 356	3. 22	3
1882	146 841 089	100	6 387 278	3. 86	3
1883	145 151 331	100	7 680 670	4. 56	3
1884	141 477 962	100	6 016 367	4. 14	3
1885	154 412 594	100	7 533 095	5. 32	3
1886	166 517 048	100	7 127 473	4. 62	3
1887	190 356 344	100	3 534 121	2. 13	4
1888	219 227 710	100	4 143 138	2. 18	4
1889	210 208 738	100	5 581 695	2. 55	4

① 参见《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87、94~95页。

从表 1 可见,在这一段时期内,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大多数年份位居第三,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但从占全国的比例来看,份额很小,浮动于 0.41%~5.32% 之间,既不能与上海相比(同期上海占 47.85%~63.63%),也与位居第二的广州有较大的差距(同期广州占 10.50%~13.39%)。这种直接对外贸易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地势使然。

汉口在这一时期的间接对外贸易,则如下表:

1865~1889 年汉口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

表 2 1865~1872 年为(上海)两,1873 年后为海关两

年 份	汉申津穗进出口总额(两)	%	汉口进出口额(两)	占总额%	位次
1865	96 062 331	100	23 245 273	24.20	2
1866	109 947 343	100	30 911 218	28.11	2
1867	107 546 557	100	30 537 026	28.39	2
1868	118 141 066	100	30 410 181	25.79	2
1869	115 599 973	100	31 049 674	26.86	2
1870	113 729 983	100	33 766 249	29.69	2
1871	138 583 592	100	39 524 205	28.52	2
1872	133 597 566	100	36 092 343	27.02	2
1873	118 022 106	100	36 339 577	30.79	2
1874	111 577 189	100	33 161 565	29.72	2
1875	119 669 205	100	32 955 514	27.54	2
1876	137 244 179	100	33 580 934	24.47	2
1877	125 793 283	100	29 396 672	23.37	2
1878	122 761 948	100	29 488 544	24.02	2
1879	137 836 085	100	36 194 494	26.26	2
1880	148 919 738	100	42 285 209	28.39	2
1881	152 952 772	100	41 599 591	27.20	2
1882	135 912 918	100	34 342 894	25.27	2
1883	125 717 592	100	35 354 885	28.12	2
1884	124 500 863	100	33 871 881	27.21	2
1885	143 557 587	100	38 247 658	26.04	2
1886	150 815 700	100	34 191 477	22.67	3
1887	152 037 522	100	33 888 944	22.29	3
1888	163 950 365	100	35 590 882	21.71	3
1889	168 677 013	100	37 610 898	22.30	3